

清代蒙古文人汉文创作概况

宏伟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清代,在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大环境中,蒙汉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尤其八旗蒙古文人,在“八旗”这个特殊而优待的社会组织中,与满、汉文人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这些蒙古文人的汉文著述,可以分为汉文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文论创作等三大类。本文介绍了清代蒙古文人汉文创作中的诗歌创作、散文创作和文论创作的主要作家及其著作。

关键词: 清代;蒙古文人;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 I52

文献标识码: A

清廷对蒙古族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把漠南、漠北蒙古族分为“八旗蒙古”“内属蒙古”“外藩蒙古”三个部分。清廷禁止蒙古族旗与旗之间的交往的同时,又禁止了蒙古人学习汉文汉语。《理藩部则例》规定:“内外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公吉、塔布囊以及蒙古官员、闲散人等遇有公文禀牒等不得擅用汉文,违者照违制例科罪。”蒙古人“生子命名均应取满洲、蒙古字义,不得辄用汉字汉义,违者以违制论。”^[1] 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性。但从宏观角度看,1636年,女真皇太极率兵南下,推翻明朝的统治,大清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封建割据局面,继元朝之后又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统一。这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而推动了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发展。清代,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文人名家辈出,作家队伍实力雄厚,诗文集卷帙浩繁,这使在明代陷入低潮的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再次进入了高潮。甚至从另一个角度说,清廷对蒙古人的一些政策是有利于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如清廷的科举制度、封授爵职及联姻婚娶等策略。清代科举制度广于元代。清廷决定蒙古八旗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八旗子弟大多生于汉地,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他们以科举入仕,同时用汉文创作了精品卓著,如梦麟、博明、和瑛、松筠、法式善、托浑布、柏葭等。封爵制度是清廷对归附的蒙古上层人物按其部落大小、人口多少、势力强弱和归顺态度给予封赐爵位官职的一种制度。目的是使这些受到封赐的蒙古上层人物死心塌地地为满族朝廷服务。受到清廷恩赐的各部蒙古王公在京城都有其住宅,而且定期入京住宿。一些王公在京城时常与汉族文人来往,不断提高汉文水平,品诗赏画,甚至用汉文创作独具一格的文学作品,如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旺都特那木吉勒汉文诗文集有《如许斋公余集》二卷、《如许斋公余集续编》、《窗课存稿》等;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汉文诗文集有《夔庵诗词集稿》和《竹友斋诗集》等。除了封授爵职制度以外,清廷对蒙古族各部王公施行了联姻婚娶制度,清朝帝王娶蒙古各部王公的公主为后妃,并将宗室公主、格格下嫁蒙古王公子弟。这些嫁

到清朝帝王的有些蒙古公主用汉文进行诗文创作，抒情对蒙古草原的思念之情，对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增添特殊的一页。这些女诗人有孝庄文皇后、那逊兰保、博尔济吉特氏等。

清代，在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大环境中，蒙汉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尤其八旗蒙古文人，在“八旗”这个特殊而优待的社会组织中，与满、汉文人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这些蒙古文人的汉文著述，可以分为汉文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文论创作等三大类。

一、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汉文诗歌创作

清代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著述中，诗歌创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据记载，有清一代，著有汉文诗集的八旗蒙古文人就有 54 人。其中，博明的《西斋偶得》、梦麟的《大谷山堂集》、法式善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存素堂诗稿》、松筠的《绥服纪略图诗》、和瑛的《易简斋诗钞》、三多的《可园诗钞》、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奉使车臣汗纪程诗》等最著名。这些诗集都获得了当时满汉文人的很高的评价。如清末著名文人谭献《〈西斋偶得〉序》中赞博明云：“蒙古西斋兵部先生，夙官禁风，拦柱下至藏万卷研求，学有心得，随笔纂录。掌故輿地，经典之刚要，援古证今，无游移傅会之陋说。学人也与，史才也与。”^[2]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二《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中云：“先生曾云，五言必从悟入，而七言古诗忽起忽落，信手拈来，纵横如意，亦非妙语不能，尤属前贤所未发。”^[3]吴慈鹤给和瑛《易简斋诗钞》撰写序文云：“公挺河岳之英，应玕衡之曜，有楷模之范，为宗栋之资，孜孜穷年，娓娓好学。其始也，虽名胄华阀而惟事缥緲；其继也，虽南北东西而必携铅槧；其云升也，虽高牙大纛不废雅歌；其耆艾也，虽黄发儿齿犹事绋素。可谓修厥德，终始于学者矣。”“乃欧（阳修）梅（尧臣）之替人，夺苏（轼）黄（庭坚）之右席。既能思精体大，亦复趣远旨超，自成一家。”^[4]王壻给法式善的《存素堂诗二集》撰序云：“四方之士论诗于京师者，莫不以‘诗龛’为会归，盖岿然一代文献之宗矣。”^[5]

清代八旗蒙古文人的诗歌创作丰富多彩、成熟精炼，充分体现了八旗蒙古文人的诗歌才华和文学素养。

（一）清代初期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诗歌创作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朝的九十年间，蒙古作家诗歌创作还处于初创阶段。清初，清朝统治刚刚在中原落下脚，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清廷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禁止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甚至禁止蒙古人学习汉文汉语。在这期间，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有色冷、牧可登、奈曼、保安等几个人。他们均为科举出身，从小受到汉文化教育，他们所创作出的诗歌作品字句精炼，内容丰富，风格豪放高昂，表现出了蒙古族雄浑豪放的性格。

色冷为顺治乙未（1655）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喜好诗文，善于吟咏。铁保《熙朝雅颂集》卷一中收其《秋兴》《题春山欲雨图》两首诗。奈曼是雍正丁未（1727）进士，官至副都统。他“治事有决断，识见甚超，故诗卓口侔侔，一往瑰奇，自是文坛小骁将。”^[6]铁保《熙朝雅颂集》卷四十中收其《壬子二月赴军营作》《途中次韵》等八首诗。奈曼之诗多描写边防军旅情景，尤其描写蒙古草原的诗歌雄浑豪迈、昂扬向上；一些感怀之诗表现作者思念亲人、故土之情，淡淡幽思，但愁思中透出豪放，表现出雄厚的民族特色。保安是雍正己酉（1729）举人。关于保安生平记载的文献资料极少，但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多在军旅中度过，晚年穷困潦倒，处境凄惨。其诗歌流传于世的只有

《送友》一诗，被选入铁保《熙朝雅颂集》卷三十九，传于世。此诗为作者年老之时的作品，反映了军旅生活和自己艰难的处境。诗流露出了虽老雄心仍在的思想感情，充满豪放气概。牧可登是雍正癸卯（1723）进士，官至刑部侍郎。铁保《熙朝雅颂集》卷三十九收其五言长律《圣主躬耕藉田诗》。诗中铺陈排比，渲染气氛，语言精练，格律严谨，表现出了清代初期蒙古族汉文诗人的成熟的汉语水平和较高的艺术素质。

清代初期蒙古作家汉文诗，虽然数量少，题材不够广泛，大多描写边疆军旅生活或抒情个人情怀。但这些诗作品语言精练，内容蕴藉，风格雄浑豪放，充分表现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点，这对清代中后期的汉文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二）清代中叶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诗歌创作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出现了“乾嘉盛世”，清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顶点。在诗歌创作方面，流派纷呈，诗学理论百家争鸣，是集古典诗学大成期。其中王士禛所倡导的“神韵说”、沈德潜所创导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最有影响。他们各举其帜，创作出了卷帙浩繁的诗歌文集。在百家争鸣、名流辈出的年代里，涌现出了一批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八旗蒙古诗人。他们的队伍庞大，著作丰硕。据考证，迄今为止，发现有诗集的诗人就有十余人。如国栋的《时斋偶存诗草》一卷、博明的《西斋诗辑逸》三卷、《西斋诗草》一册、梦麟的《梦喜堂诗》《燕喜堂诗》六卷、《嵩云集》四卷、《大谷山堂集》六卷、博卿额的《博虚宥诗草》三卷、嵩贵的《邮囊存略》、白衣保的《鹤亭诗抄》四卷、和瑛的《易简斋诗钞》四卷、《太庵诗稿》九卷、《风雅正音》六册、法式善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二十四卷、《存素堂诗二集》八卷、《存素堂诗稿》（又名《诗龕咏物诗》）二卷、《存素堂诗帖诗》一卷、《诗龕诗稿》一卷、《诗龕声闻集》五卷、《法诗龕罗两峰西涯诗画册》一册、松筠的《绥服纪略图诗》一卷、《西招纪行诗》一卷、《秋阅吟》一卷、景文的《抱筠亭集》一卷、佛喜《友莲堂集》一卷、熙春的《友莲堂合璧诗存》、文孚的《秋潭相国诗存》不分卷、柏葭的《薛籛吟馆钞存》十卷、托浑布的《瑞榴堂集》四卷等等。其中，有些八旗蒙古诗人在乾嘉诗坛上较有名气，如梦麟、博明、松筠、法式善、和瑛、托浑布等。

梦麟“弱冠而登进士入翰林”，年仅 18 岁就中进士，是有清一代科举史上最年轻的进士之一。又是在清代第一位驰名文坛的八旗蒙古汉文诗人。他才华横溢，“自少以能诗名，后益浸淫于汉魏六朝暨唐宋元明各大家，消闲清远之旨与感激豪宕之气并发于行墨，四方才俊揽其所作无不变色却步。”^[7] 其诗歌作品主要是反映百姓疾苦、抒个人情怀、描写北国风光及军旅生活，激楚苍凉，驰骤豪荡，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时人沈德潜评其诗曰：“志高格正，乐府胚胎汉人；五言咀含选体，即降格亦近王、韦；七言驰骤豪荡宗太白，沉郁顿挫宗少陵；离奇环伟宗昌黎。”^[8] 博明是精通蒙、汉、满、藏文的著名的八旗蒙古诗人。他“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其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骑射、翻译国书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藏）诸字母，无不贯穿娴习。”^[9] 其《西斋诗辑逸》和《西斋诗草》中的诗歌直率坦露，充实纯熟，表现了清代中叶八旗蒙古族汉文诗人较高的艺术素质。而松筠、和瑛是清乾隆嘉庆期间的封疆大吏，又是蒙古族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们驻疆多年，其间用汉文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边疆人民生活习俗、社会政治、山川风物的诗歌作品。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描写民族地区的历史事件、政治风云、山川草木、生活习俗、民生疾苦，富有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和瑛的《易简斋诗钞》以创作先后排序，描写西藏、新疆的自然风光、文物建筑、民俗习惯、百姓生活，有些运用“鄂博”等蒙古语，更加加深了民族特色。法式善是蜚声

于乾嘉文坛的文学家。其文学著作卷帙浩繁、门类众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中《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存素堂诗稿》《存素堂诗帖诗》《诗龛诗稿》《诗龛声闻集》《法诗龛罗两峰西涯诗画册》等诗集收集了作者不同时期创作的 3000 多首诗歌作品。他的诗歌以“性情”为主，“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沿前人，及描摹名家、大家……又可别树一帜。”^[10] 托浑布的诗集有《瑞榴堂集》，按年编排，“义本敦厚，语必清新。”^[11] 清代中期的这些蒙古族汉文诗人大多都生长在中原地区，通过科举考试入廷做官。他们从小接触和学习的是汉文化，一生与汉族文人名士过从甚密，所以他们的诗歌作品与同时代的汉族诗人的诗作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梦麟的诗豪放雄浑，继承元代以来蒙古族诗人汉文诗作品的雄浑宽广的特点，而和瑛、松筠的描写蒙古自然风光的诗歌孕育着浓厚的恋土之亲情，表现出了亲切的民族心理，尤其和瑛的一些诗选用一些蒙古语，加深了作者热恋故土和母语的民族心理。从而使这些八旗蒙古作家的汉文诗歌与同时代，八旗满洲诗人和八旗汉军诗人的诗歌分别开来，别具一格，具有了独具的蒙古民族特点。清朝中期的八旗蒙古诗人的诗歌创作的发展为清末民国初的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清末民初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诗歌创作

清末年间，清廷对蒙汉文化交流的种种限制已逐渐松弛。清初至清中叶，清廷限制汉人进入蒙古地区，又限制蒙古人学习汉文化、进入中原和蒙汉通婚。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种种限制逐渐松弛，大批的内地汉族农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出现了蒙汉杂居的情况，蒙古人学习汉文字、汉文化，为蒙汉文化交流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清末民初，八旗蒙古作家汉文诗歌创作更加繁荣发展，作家队伍空前扩大，诗文著作硕果累累，名著力作辈出，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八旗蒙古诗人已达到 50 余人，诗集有 100 余部。如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十四卷、瑞常的《如舟吟馆诗抄》一卷、花沙纳的《韵学斋小草》《出塞杂咏》一卷、《东使吟草》一卷、《汾园吟草》、壁昌的《壁参帅诗稿》、布彦的《听秋阁诗抄》一卷、桂懋的《德山诗录》、博尔济吉特氏的《北归草》、谦福的《桐华竹实之轩梅花酬唱集》、《桐华竹实之轩诗抄》一卷、瑞庆的《乐琴书屋诗稿》四卷、《乐琴书屋诗集》、盛元的《怡园诗抄》、来秀的《扫叶亭咏史诗集》四卷、清瑞的《江上草堂诗集》二卷、燮清的《养拙书屋诗选》二卷、柏春的《今园诗抄》十卷、锡镇的《退复轩诗》四卷、恭钊的《酒五经吟馆诗草》二卷、《酒五经吟馆诗余草》一卷、那逊兰葆的《芸香馆遗诗》二卷、梁承光的《淡集斋诗钞》、铁祺的《寿卿诗抄》、延清的《巴里客余生草》六卷、《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三卷、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如许斋公余集》二卷、贡桑诺尔布的《夔庵诗词集稿》《竹友斋诗集》、三多的《可园诗钞》六卷等等。

其中，花沙纳的《出塞杂咏》、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如许斋公余集》等是民族特点浓厚的诗集。这些诗集中的诗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蒙古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民生活、民俗习惯、地理历史，蕴涵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对蒙古族汉文诗歌奉献了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的诗篇。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中的《西望》、《晓发登吉乌苏用景佩珂学士诗韵》等诗描写了辽阔的蒙古草原、牛羊、绿草、鲜花，写到“闲花蔽野燕脂染，细草沿途马蹄侵。羊散满坡谁点缀，见人惊起下遥岑。”“赤城地接三汗近，碧落天围四野低。点缀坡前羊遍放，奔驰道上马频嘶。”诗中满腔热忱，充满爱心，具有了浓厚的民族特点。

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也是清末民初八旗蒙古汉文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三多的《可园诗钞》等诗集的诗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被侵略的历史。如《庚子都门纪事诗》

反映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的历史现实，被称为“诗史”。诗集中的《纪事杂诗》《都门杂咏》《纪事杂诗二十首》是代表作。诗中描写侵略者狂轰滥炸，“夜半炮声起，听之必骇然。无屋不掀破，有垣皆洞穿。”城破后“穿搜遍城杜，遇者何曾饶？衣并积尸委，杵随流血漂。”（《纪事杂诗》）侵略者还大肆掠夺京城财宝，“金穴铜山外，难穷府库财。一朝植客至，搜括厌装回。”真实而形象地描画了侵略者的可恶的罪脸。三多的《可园诗钞》中诗歌大多也是反映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的诗篇。如《纪变·五月二十三日》诗描写了八国联军侵入京城，京城变成战场，人民惨遭屠戮的情景，诗中写到“奇算空前古，神京作战场。中西赌一掷，家国听双亡。轻敌韩苏谬，谈元王谢狂。诸公生应运，从此或垂裳。”“满空飞弹雨，性命等鸿毛。个个颜蒙甲，人人手带刀。贪天功尚在，背云陈休逃。南望中兴将，勤王振羽旄。”诗中痛斥侵略者的罪行，同时赞扬了蒙颜带刀的反侵略者。《西望行在敬赋·十三日》《感时》《回京书慨》等诗同样都描写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历史事件。三多的《可园诗钞》和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表现了清末民初八旗蒙古汉文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

古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发展至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极力创作佳篇力作，将古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推向高峰期，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逐渐发展成熟，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蒙古族古代文学都奉献了宝贵的诗歌遗产。

二、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汉文散文创作

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汉文创作中散文体著作为数不多。清代前期的八旗蒙古文人汉文著述里未见散文体著作。而到了清代中期，一些八旗蒙古文人用汉文撰写了诸多散文体著作，其中较有名的有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存素堂文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锡珍的《奉使喀日喀纪程》、博迪苏的《朔漠纪程》等。

法式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他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时，留意于搜集清代科举考试资料，编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两书。他的散文体著作还有《存素堂文集》《同馆试录汇钞》四十八卷、《乾隆己亥恩科各省乡试齿录》一卷、《成钧课士录》《陶庐杂录》。《清秘述闻》共十六卷，记录了从清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四年（1799）之间的每年考官、考题以及考生的姓名、籍贯、各省学校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槐厅载笔》分类记录了清代文人作品中的有关考试方面的文章。此书“凡所征引具有成编，都非臆造的断章取义，葑菲不遗。费以全书，遂湮只句，轶闻逸事，求备取盈而已。”^[12]时人称这两部著作为“实事求是，文献足征，详矣，确矣。”^[13]赵味本称赞曰：“述闻、载笔二书皆不朽业。”^[12]《存素堂文集》共收五十六篇作品，分为论、考、辨、序、跋、书、书后、例言、传、壮、墓表、墓志铭、碑文、记、铭等十六类，其中为自己和别人的诗文集撰写的序跋文占多半纸张。嘉庆十二年（1807）文人程邦瑞在扬州刊印，随后《存素堂文续集》也问世。《成钧课士录》“风行海内，几至家有其书。十余年来习其诗文者，无不辍科节而去。至是同馆赋诗，学侣亦皆奉为圭臬。”^[14]《陶庐杂录》共六卷，记录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树木、历史资料等。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文人陈虞在京城刻行，有翁放纲之序。

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倭仁生长于汉地，从小接受的是汉族传统文化教育，是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汉化的蒙古族“理学大师”。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

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驻叶尔帮办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职。倭仁有散文体著作《倭文端公遗书》。《倭文端公遗书》由《启心金鉴》卷上、卷下和十一卷构成。其首卷上下两册为皇帝赐名的《启心金鉴》和《沃心金鉴》。主要辑录了历代帝王“治乱”“治世”事迹和古今朝臣的奏议，作为教授皇帝的辅助教材。卷一有九篇文章，是教授皇帝的主要讲义；卷二收录了其任职以来的奏疏七篇；卷三为《为学大指》，是一篇义理文章，分为“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等六条；卷四至卷七是日记；卷八是杂稿，主要包括诗歌、题词、书信和教导子侄辈言论及与朋友探讨问题的文章内容；卷末附《吏治辑要》，摘录历代人做官要则，让其子侄仿效。显而易见，《倭文端公遗书》中占据大多数篇章的是日记，日记共四卷，长短不同，有的是短章，而有的是长篇。日记里真实详细地反映了倭仁的政治观点、伦理道德及治学经验和人生的感悟。如卷四日记中说：“人生不过百年，富贵浮云，皆非我有。”“将名利心打叠净方能笃实光辉”“人能禁得冷耐得穷，便有几分人品”^[15]等等。这里他反复申诉鄙薄富贵、淡于名利、甘于清贫。《倭文端公遗书》中的散文感情充沛、逻辑严密、文字精练，充分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与理学思想。

锡珍的《奉使喀尔喀纪程》是同治十三年（1874）奉使赴喀尔喀车臣汗的往返途中写的日记性散文。锡珍（1847-1889）是清末年间的八旗蒙古作家，字席卿，蒙古镶黄旗人，额尔德特氏。其曾祖父和瑛、祖父璧昌都是著名的八旗蒙古文人，蒙古族汉文作家。锡珍生长在文士世家，从小能诗工书。同治七年（186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理藩院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锡珍有《奉使喀尔喀纪程》《朝鲜颂诰》《台湾查辨》等三部日记性纪程散文。同治十三年（1874），锡珍奉使喀尔喀车臣汗祭奠阿尔塔什达之福晋鄂卓特氏，往返六十一天，九千里，记录途中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奉使喀尔喀纪程》。文中“观景记事，文笔雅趣，虽在暴风骤雨、荒路僻径中，亦能详述驿站距离。兼有吟咏，其中《穹庐赋》一篇，骈俪之文，并非堆砌之作，此书足以上追其曾祖和瑛之《西藏赋》。”^[16]《奉使喀尔喀纪程》中记录了“无树无村，空旷无际”、“芳草满山，青光到眼”“一片荒沙，查无人迹，惟见野羊狐兔群窜而来”^[16]的蒙古草原的旷广情景、好客善良的蒙古人性格和祭奠鄂博等习俗，“记事翔实，文字典雅，书法劲练”。^[16]如文中详细记载了途中所见的蒙古族摔跤比赛的情况，“戊午，由克鲁伦河巴英格勒图台启行。七十里巴拉贡塔拉冈阿倭拉阿尔乌苏，此台仍是汗旗设。六十里哈尔达尔札萨克旗所设台三音乌苏，以五刻而至。角扑，蒙古之长技也。薄暮闲暇，命之扑，以为戏。扑分两队，序东西立。队有长，指挥之，高声嚇嚇，则队各一人出，踊跃而前。就场始两相觑，手作欲搏状，突而换颈挤额，拦腰捉臂，四足蹴踏，扬起沙尘，其骸如柱，其臂如梁，触抵支撑可馁，即山颓矣。或一对，或三两对，回合盘旋，势均力敌。扑不善，其长则挺挹其臂，臂声如鼓，砰砰然也。扑已，乃复稽首顿首，蹈舞百拜，遂犒以霍尼音马哈达马噶，咸欢喜而去。”^[16]他还详细地记录了大漠南北蒙古族习俗的差别，写道：“漠南北风俗大同小异，在台应役者亦有内地官吏浮滑习气。漠北人多长大，其色黑，其衣衣布或当暑而裘，其食肉，则架火烧之，炒米日一合，沃以茶乳，即饕餮矣。人家隔数十里，犹比邻也。聚居则落落两三家，相去数十武，以绳为垣。牛羊系焉，羔犊群鸣，杂以犬声。毡屋大不能数尺，衣履篋笥，瓶罍杵经卷佛像，皆在其中。漠南妇人绾羊角髻，璎珞垂垂，下与颌齐。漠北妇人编发而不饰，衣履同男子，惟坠耳一环，蒙头一巾，不然安能辨是雌雄也。虽妇孺乘马，稳如座床，人马如铸成，牵群马而唱高歌，一瞥百里，此即中原健丈夫未能过之。”^[16]纪程文中还有一赋《穹庐赋》，赋中描写蒙古包的来历、结构等，舒畅欢快，对蒙古民俗研究均为宝贵的资料。

博迪苏是哲里木科尔沁人。任御前大臣、蒙古正蓝旗都统等。其祖父是爱国主义将军僧格林沁。博迪苏“耽心翰墨，好为诗”，但“诗成，随手散轶，不录副也。”^[17]所以其流传下来的诗文极少。

《朔漠纪程》是其奉使喀日喀的往返旅途的纪程文。光绪三十二年（1906），博迪苏“钦奉谕旨派赴喀拉喀考察古游牧事宜，同奉派者达阁学寿。”^[17]往返万余里，三月十六日从京城出发，六月二十九日回京城，博迪苏记录六十一天旅程中的所见所闻，命名为《朔漠纪程》。《朔漠纪程》后还附了纪程诗数十首，其中博迪苏的十一首、魏震的六十五首、达寿的七首。这些诗吟咏了塞外朔漠草原的美好风景。而纪程文详细记录了当时蒙古地区的人口、人民生活状况、民俗、宗教等的同时，记载了自己的感悟。其中，详细记录了与当时住喀日喀的达赖喇嘛的对话，指出了黄教对蒙古民族带来的危害。文中说：“查达赖自本年三月初七日来咱雅班第达库伦，住此逾百日。该库伦疲于供億。闻蒙民言，此间生计，恐三年不能复旧去。”“该旗盟长亦言，前达赖在咱雅班第达驻一百一十日，即羊支米麦食物等一项计之，已费银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余两，余如毡房夫马薪柴物等项，尚不在内。”^[17]这是黄教对蒙古人民带来的极大的经济负担的真实写照。关于蒙古摔跤、赛马等习俗的记录，如：

“十七日，晴。咱雅班第达附近各部落王公演蹯跲跑马，为达赖送行。王公等先期约往观。是日乃先往见达赖。谢谢餽食物，并送达赖黄缎二尺以申贺意。缘往观者皆须持物为贺也。达赖遣入肃客入行帐，陈酪浆茶果。演蹯跲者约百余人，分队登场，多裸身。先向达赖合什膜拜，然后相对角技。两人相持，必令一人扑倒为胜。胜者仍向达赖合什膜拜不止，并与负者相抱为礼，跳舞而退。是颇得尚武之遗意。”“十九日，晴。达赖遣人约看跑马射的（即爱罕也）。张羊皮九张为侯。射者耦进，先稽首于达赖前，然后角射，命中者绝少甚矣，武备之不够也。跑马者多蒙古少儿，上下山谷，绝尘而奔，先至者为胜。先至之马，即以献达赖。达赖系以哈达，狡以酪浆，旌其异也。是时即有小喇嘛牵之向达赖致颂词。各旗王公赛跑之马，陆续遣入，手牵以进。各致颂词。其大意系声明何人之马，并赞马之良好，绕马场三遭，三致颂词而退。午后山雨大至，乃归。”^[17]这些都是当今蒙古族民俗研究的宝贵的资料。

三、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汉文文论创作

到了清代中期，随着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著述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他们的汉文创作中出现了文论之作。在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汉文文论之作中最著名的是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八旗诗话》、松年的《颐园论画》和布颜图的《画学心法问答》等。除此之外，还有法式善、梦麟、锡缜等八旗蒙古文人的序跋文。这些序跋文中作者论自己或他人的诗文时，充分论述了自己的文学理论观点。如有法式善的《〈蔚岷山房诗钞〉序》《〈金青斋环中庐诗序〉》《〈容雅堂诗集〉序》《〈钱南园遗诗〉序》《〈尚絅堂诗集〉序》《〈存素堂诗初集〉自序》《〈竹屋诗钞〉序》《〈梧门诗话〉例言》《与徐尚之论文书》《〈洞麓堂集〉序》《〈慕堂文钞〉序》《〈春融堂集〉序》和在满洲八旗文人盛昱所编《八旗文经》中收录的法式善、柏葰、锡缜、那苏图、松筠、布颜图、博明、裕谦、瑞常、文孚等的序跋文。

（一）法式善的《梧门诗话》

《梧门诗话》是法式善的诗学理论专著，也是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中的诗学专著。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八旗蒙古文人、蒙古族汉文诗人、诗歌理论家法式善（1753～1813）在其晚年撰写完成了诗话体专著《梧门诗话》。法式善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下进行文学创作，他受到了王士禛和袁枚的直接影响。但他并未盲从，在学习王士禛和袁枚的同时，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和审美情趣，针对当时诗坛上的现象，在《梧门诗话》的诗歌品评中提出了自己别树一帜的诗学观点。

他在《梧门诗话》中以“性情”为主的前提下，提出了自然新丽、幽峭、含蓄有味、精练有骨等诗歌本体、风格、创作技巧、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观点。这无论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还是在蒙古族古代文论的建成中都具有其应有的贡献。《梧门诗话》共十六卷，评诗条目约有 898 则之多。卷一至卷十四品评了同时代的有名之士和无名之士的诗歌，卷十五、卷十六则是当时诗坛上的闺秀一百余人的诗歌。全篇着重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后之人”的作品，《梧门诗话》多乾隆、嘉庆两朝文献，是研究乾嘉诗坛上的诗人的思想与其诗歌作品的重要资料。

（二）布颜图的《画学心法问答》

《画学心法问答》是清代康熙年间八旗蒙古文人布颜图之艺术理论专著。《画学心法问答》是以回答其学生淮阴人戴德乾的问题的形式写成的文艺理论专著，共由序、小引和 37 个问题的解答等三大部分组成。该文艺理论专著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论述画学理论时，以“意境”作为根本，虽然师徒俩“或坐或卧，或语或默，默则凝神，语则论画。随问随答，随著随录，而语无伦次，故答无先后。有一问而一答者，有一问而数答者，有问而不答者，有不问而答者。盖触机而问，随机而应，不限格制，不计日月。”^[18]看似没有严格的结构，也未能构成系统，但它涉及画学理论的各个领域，成了山水画理论的重要理论专著，并代表了乾隆初期的画学理论水平。

（三）松年的《颐园论画》

《颐园论画》是清末八旗蒙古文人松年之艺术理论专著。松年于其六十一岁之际，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撰写完成的。《颐园论画》是松年在“枕流画社”盟主期间的讲稿。全文不分章节，随笔所录，有自序和附诗。《颐园论画》“总体介绍画学理论问题的同时，为了教授初步学绘画者，详细介绍了用笔墨、用水墨、画山水、绘画技巧、创造意境鉴藏纸粉、画人物花草及跟随老师临抚古人和鉴别书画真假之道等有关艺术理论方面的很多问题。”^[19]《颐园论画》中松年总结自己一生的绘画实践，提出了自己独到一面的艺术观点。其内容“平正通达，不囿于古，不泥于今，专家研求，初学入门，无不适合。”^[20]它主要是注重作家的人品、练习的同时，提倡了苦练成真果的艺术家思想。概观其中的文艺观点，“书画同源”之观点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

（四）清代八旗蒙古文人的序跋文

除了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布颜图的《画学心法问答》、松年的《颐园论画》等重要的汉文文论专著以外，清代八旗蒙古文人用汉文给自己或他人的诗文集里撰写序跋文，其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思想。还有很多以诗论诗的作品。法式善的《存素堂文集》中收录了法式善的序跋文 255 篇。除此之外，清代满洲八旗文人盛昱的《八旗文经》中收录清代八旗蒙古文人的序跋文、书、记、碑文、墓志铭等汉文著述。

《八旗文经》中所选的八旗蒙古文人的著作如下：

柏葭：《避暑山庄赋》（卷五）

法式善：《西涯考》（卷十）

《〈北海郑君年谱〉序》（卷十三）

《〈洪文襄公年谱〉序》（卷十三）

《〈重修族谱〉序》（卷十三）

《〈康熙己未词科掌录〉序》（卷十三）

《〈鹤征录〉序》（卷十三）

《〈重刻己亥同年齿录〉序》（卷十三）

《〈金石文钞〉序》（卷十三）

《〈清秘述闻〉自序》（卷十五）

《〈槐厅载笔〉自序》（卷十五）

《〈备遗杂录〉自序》（卷十五）

《〈洞麓堂集〉序》（卷十七）

《〈慕堂文钞〉序》（卷十七）

《〈春融堂集〉序》（卷十七）

《〈成均课士录〉序》（卷十七）

《〈成均课士续录〉序》（卷十七）

《〈金青斋环中庐诗〉序》（卷十九）

《〈蔚巖山房诗钞〉序》（卷十九）

《〈钱南园遗诗〉序》（卷十九）

《〈尚綱堂诗集〉序》（卷十九）

《〈存素堂诗初集〉自序》（卷十九）

《〈容雅堂诗集〉序》（卷十九）

《〈竹屋诗钞〉序》（卷十九）

《〈梧门诗话〉例言》（卷十九）

《〈朋旧及见录〉例言》（卷十九）

《赠曹复堂序》（卷二十）

《何双溪先生六十寿序》（卷二十）

《陆先生七十寿序》（卷二十）

《〈江湖后集〉跋》（卷二十三）

《国子监司成题名碑录跋》（卷二十三）

《翁覃溪先生临文待诏书跋》（卷二十三）

《纪晓岚尚书藏顺治十八年缙绅跋》（卷二十三）

《鄂刚烈遗墨跋》（卷二十三）

《德文庄公遗墨跋》（卷二十三）

《石食十二代诗选跋》（卷二十三）

《南宋书书后》（卷二十三）

《臧和贵形状书后》（卷二十三）

《成雪田尺牍书后》（卷二十三）

《与邵二云前辈书》（卷三十五）

《与徐尚之论文书》（卷三十五）

《复王穀胜进士论仕书》（卷三十五）

《复汪均之书》（卷三十五）

《与王柳村书》（卷三十五）

《南薰店古像记》（卷四十）

《历代帝王名臣遗像记》（卷四十）

《诚求堂记》（卷四十）

《重装钱南园副使画马记》（卷四十）

《戒台图裕轩曹慕堂两先生祠记》（卷四十）

《思过斋记》（卷四十）

《校永乐大典记》（卷四十）

《借绿山房画集记》（卷四十）

《校全唐文记》（卷四十）

《重修尚氏家庙碑文》（卷四十四）

《明大学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卷四十四）

《例授奉直大夫礼部主事吴君墓表》（卷四十八）

《耿处士墓表》（卷四十八）

《察御史谢君墓表》（卷四十八）
《朝议大夫宁夏府知府何君墓表》（卷四十八）
《南阳清军同知林君墓志铭》（卷四十九）
《封中宁大夫浙江分巡温处兵备道李公墓志铭》（卷四十九）
《武虚谷传》（卷五十三）
《周赞平传》（卷五十三）
《侍卫恒公家传》（卷五十三）
《先妣韩太淑人行状》（卷五十三）
《洪稚存先生行状》（卷五十三）

锡缜：《宋太祖顾命论》（卷十）、《霍光论》（卷十）

《王处士印萃序》（卷十五）
《〈求是山房遗集〉序》（卷十七）
《〈西轡依永集〉序》（卷十九）
《送刘子迎同年达善之官湖南序》（卷二十）
《书故静宁协副将张君遗像后》（卷二十四）
《跋梁闻山大令临宋秘阁帖后》（卷二十四）
《书王禹卿赠朱子颖诗卷后》（卷二十四）
《报慕菴园先生甲林书》（卷三十五）
《上杨澹人先生书》（卷三十五）
《与周韬甫腾虎书》（卷三十五）
《与翠岩论文书》（卷三十五）
《庐台述》（卷四十）
《宁夏满城文昌庙碑》（卷四十四）
《故明梁烈女碑》（卷四十四）
《皇上万寿恭颂谨序》（卷四十五）
《刑科给事中蒋君墓志铭》（卷四十九）

《太子少保漕运总督文公墓志铭》（卷四十九）

《书李孝子》（卷五十四）

《浙江按察使国公家传》（卷五十四）

《所乐轩解》（卷五十五）

《所乐轩后解》（卷五十五）

那苏图：《〈海国闻见录〉序》（卷十二）

松筠：《〈绶服纪略〉序》（卷十三）

《〈静宜室诗集〉序》（卷十九）

《阻东巡奏》（卷二十八）

《巡边记》（卷四十）

布颜图：《〈画学心法〉序》（卷十三）

盛元：《南康府志自序》（卷十三）

博明：《〈凤城锁录〉自序》（卷十四）

《〈西斋偶得〉自序》（卷十四）

《题评本昌黎诗集》（卷二十二）

和瑛：《西藏赋》（卷四）

裕谦：《〈勉益斋偶存稿〉序》（卷十五）

《陈明殫竭血诚身先作则以尽臣职奏》（卷二十八）

瑞常：《〈国朝正雅集〉序》（卷十九）

文孚：《时斋偶存诗钞跋》（卷二十四）

倭仁：《敬陈治本奏》（卷二十九）

《陈禹省官民情形奏》（卷二十九）

《请罢正途入同文馆奏》（卷二十九）

《请崇俭以光圣德奏》（卷二十九）

璧昌：《坚壁清野议》（卷三十）

恩隆：《演连珠四首》（卷五十五）

并附了布颜图、博明、和瑛、法式善、松筠、文孚、裕谦、璧昌、柏葭、倭仁、瑞常、盛元、锡

绩等八旗蒙古文人的小传。其中的一些序跋文、记、书，是文学理论力作。

清代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文论是在汉族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中创作出来的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蒙汉文化关系的结晶，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文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学习与借鉴了汉族古代文论。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这部分民族文论遗产也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清代文论，而且对蒙古族文学理论体系的构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清]理藩部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部则例[M].卷五十三，违禁，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 [2] [清]谭献.《西斋偶得》序[M].光绪二十六年刻本《西斋偶得》卷首.
- [3] [清]王昶.春融堂集[M].卷五十二《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清刻本.
- [4] [清]和璞.易简斋诗钞[M].吴慈鹤序，清刻本.
- [5]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M].王墉序，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 [6] [清]铁保.熙朝雅颂集[M].卷四十，嘉庆九年（1804）刻本.
- [7] [清]法式善.梧门诗话[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七十七中，1974.
- [8] [清]梦麟.大谷山堂集[M].沈德潜序，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 [9] [清]博明.西斋杂著两种[M].翁方纲序，北平文殿阁书局，1935.
- [10]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M].洪亮吉序，嘉庆十三年（1808）刊本.
- [11] [清]托浑布.瑞榴堂集[M].林则徐序，道光十八年刻本.
- [12] [清]法式善.槐厅载笔[M].清嘉庆四年（1799）刻本.
- [13] [清]法式善.清秘述闻[M].卷上，朱圭：《〈科名故实二书〉序》，嘉庆己未（1799）年序刊木刻本.
- [14]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M].嘉庆丁卯（1807）刊本.
- [15] [清]倭仁.倭文端公遗书[M].卷四，张凌霄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
- [16] [清]锡珍.奉使喀尔喀纪程[M].载于《清代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1990年.
- [17] [清]博迪苏.朔漠纪程[M].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三省堂印刷部印刷.
- [18] [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A].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C].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
- [19] 巴格日勒图.蒙古文论史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578.
- [20] [清]松年.颐园论画[M].跋语，载于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Chinese Literature of Mongolian Literati in Qing Dynasty

HONG Wei

(Center for Mongolia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ngolia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go deep further within the big environment of great u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specially the eight banners Mongolian literati who are in “the eight banners” such a particular and special tre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influence and learn with Manchu and Han reciprocally, and make literature in Chinese. These Chinese works of Mongolian literati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ose are Chinese poetry, prose and literary work. This paper gives introduction about the Chinese literatures’ main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of Chinese poetry, prose and literary work which are made by Mongolian literati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Mongolian literati ; Chinese literature

收稿日期: 2016-1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清代蒙古游记研究”(14XZW032);

作者简介: 宏伟(1975-),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研究院,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蒙古族古代文学、蒙古文论方面的研究。